

编者按



宋耀如与孙中山二人的认识，是他们宕荡人生历程中的重要篇章，也是他们共同铸就的时代杰作。自那以后，宋耀如终其一生都在无私帮助孙中山，倾力支持革命。对中国革命造成至关重大的影响，由此也奠定了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与历史影响。

那么，宋孙认识于什么时候呢?史料的记载是在1894 年,但是又有说法说是在 1892 年。

要说“1892 年说”的源头,其实还是出现在日本学者的研究心得中。久保田博子在《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兼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1984 年)中说:“1892 年陆皓东由上海到广州,与孙文等革命同志有过来往。……宋嘉树去广东,通过陆皓东与孙文联系是有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久保田博子说到此事时还犹豫不定,用了“有可能”的说法。但是,这种本是“可能性”的事情,到中国史家笔下便变是言之凿凿的事实了。

林博文在《近代中国史第一女主角》中说:“1892 年,经陆皓东介绍,宋嘉树结识孙中山。宋决定全力支持孙中山,并以财力资助革命。”

林日兴著《海南史》(2002 年)说:“宋氏热爱祖国,倾向革命。1892 年经陕西省陈浩东介绍结识孙中山,并成为挚友,他家也就成了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和秘密通讯机关。”文中“陕西省陈浩东”应为“广东省陆皓东”。

这些著者说的还只是“结论”,未见考证,那么这些结论又是来自何处? 其实来自一些专家学者的“考辨”。

这很大程度上,是对孙中山一段回忆的“自说自话”。

1912 年 4 月,孙中山在《致李晓生函》中这样述说与宋耀如的旧事:“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陆皓东,名中桂,号皓东,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孙中山同乡和村塾学友。1884 年到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毕业后派至上海电报局充领班生。1890 年因觉在沪碌碌无为,乃由沪返粤。1895 年 10 月 26 日,兴中会谋划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人被捕后于 11 月 7 日就义。

宋耀如之所以被称为革命的“隐君子”,后人所本正是孙的《致李晓生函》。查《辞海》,“隐君子”即隐士,即隐居不仕的人。观宋一生行事,其以“从事教会及实业”的公开身份,而“隐则传革命之道”,这个名号用在他身上真的是恰如其分。后人已经看到宋是一个“不求知于世”的不事张扬的低调行事者。

孙中山说“二十年前”曾与宋耀如初谈革命,而宋“二十年来始终不变”,以 1912 年来“推算”,那么“二十年前”即 1892 年。一些专家学者就是这样机械地“算出”宋孙认识的开始日期是 1892 年的。

尚明轩在《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1986 年)中就这样说:“孙中山是宋庆龄之父宋嘉树(字跃如)的同志和朋友。宋嘉树与孙中山的交往,过去一般认为是开始在 1894 年春季,即孙中山为了谋求民富国强,偕陆皓东北上上书李鸿章时,途经上海而结识的。然而,孙中山在 1912 年 4 月 17 日《致李晓生函》中云:宋嘉树乃是‘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据此,再结合 1892 年陆皓东曾到广州与一些人有过交往,宋嘉树到广州有可能通过陆皓东与孙中山联系的推断,他们二人结识的时间要比 1894 年为早,应是在 1892 年间前后。”这些内容,作者还写进所著《宋庆龄传》



认识孙中山是在 1892 年吗？

文/钟一

为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海南周刊自 8 月 29 日起开辟《宋耀如史话》专栏,约请海南学者钟一撰写系列文章,为读者层层解码宋耀如这位为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隐君子”的传奇人生。

专栏开辟以来,已陆续刊发了《宋耀如:生于 1861 还是 1866?》、《宋耀如:祖籍山西还是河南?》、《祖辈是不是客家人?》、《始祖韩显卿迁琼有多久?》、《曾祖父为什么是韩仁循?》5 篇文章。这组文章史料翔实、考证严谨,厘清了诸多谬误,还原了不少历史真相,赢得了读者和学界的关注。

按原定发稿计划,《宋耀如史话》专栏接下来拟刊发的本是《祖父韩锦彝是“老洪”头头吗?》。

然而,今天,2011 年 10 月 10 日,适逢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日。宋耀如是何时认识孙中山的?他对辛亥革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这些问题显然尤为读者所关注。因此,本刊特约请作者撰写《认识孙中山是在 1892 年吗?》、《认识孙中山为什么说是在 1894 年?》、《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函促”孙中山归国意义何在?》5 篇文章,以飨读者。

(1990 年)之中,影响可见一斑。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所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1992 年)中,也这样摇摆不定地说:“孙、宋两人至迟在 1894 年就已相识,甚至还可能更早一些。”看来,作者是受到“考辨”说的影响。

尚明轩的“推断”也还是出于“有可能”的考量,而若说“考辨”最为认真吃力者,当数沈渭滨。在见识他的“考辨”之前,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其所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1993 年)中,原本是这样清楚地写着:“1894 年春,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途中在上海逗留时结识宋嘉树,宋完全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热心支持者。”

但是,到后来他在《孙中山与宋嘉树》(2009 年)的文章中,则这样明确指出:“断定两人首次接触于 1894 年,不合情理”。此文先是作为 2009 年 4 月“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收入在当年 9 月出版的《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之后又以《孙中山与宋嘉树首次接触考辨》为题,发表于当年第 8 期的《探索与争鸣》上。

作者首先申明孙宋认识的意义,颇有见地:“孙中山与宋嘉树,既是志同道合、终身不渝的革命同志,又是结秦晋之好的翁婿。孙宋关系是辛亥革命史、宋氏家族史研究的重要篇章。其中,孙宋的首次接触,不仅奠定了孙宋关系的基础,而且对宋氏家族的尔后影响和发展至关重大。”

之后作者又设问:“孙中山和宋嘉树的第一次接触始于何时?至今仍扑朔迷离”,“其实,根据孙中山自述,两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 1892 年。”其根据就是孙中山 1912 年 4 月的《致李晓生函》:“信写于 1912 年 4 月,所称‘二十年前’,上推应是 1892 年;又曰‘初谈革命者’,当属首次接触之谈,但信中没有提及接触的地点在哪里。”又称:“‘二十年前’是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定语,不是一个模糊的约数。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其他时间的情况下,不应作为约数来解读。”

对此,我们现在可以初步回答,这个“二十年前”是个时间约数,而不是定数;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孙宋初次认识于 1894 年,而不是 1892 年。

作者又说:“现在没有史料可以说明宋嘉树为什么在 1892 年会和孙中山有所接触。比较合理的解释,一是双方都是基督徒,宗教救世的信仰,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二是两人都有改良祖国、拯救同



1913 年初,孙中山作为全国铁道督办偕宋耀如(前排左一)等访日考察。宋耀如一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助益良多,却极少直接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现身。1913 年随孙在日本的一系列活动留下了他为数不多的出现在历史前台的画面。

群的共志。”

这就有点奇怪了。两个人“相知”可能需要共同的志向或者说志同道合,但两个人初次相识需要这样的思想境界来“约定”吗?作者还用很大篇幅来解释孙宋“首次接触的思想基础”,实在大可不必。我们还未听说两个人在某个地方、某个场合认识,是需要“思想基础”的。

作者又“考辨”说,孙宋认识的居间“撮合人毫无疑问应是陆皓东”。但是,再看文中这些模棱两可的语言,结论焉能让人相信?这些连作者自己都无法判断的话语如:“现在没有确切资料说明陆皓东何时结识宋嘉树”,而陆皓东“与执教于该堂主日学校的宋嘉树相遇相识,并非没有可能。这虽是推测,但合乎情理”。“陆皓东与宋嘉树之所以选在 1892 年南下,没有具体作证的史料,但可以从若干蛛丝马迹中寻绎出比较合理的解析。”

作者还从天时、地利、人和、机遇等方面进行“考辨”孙宋的初次相遇,然后说:“孙中山、宋嘉树,在陆皓东居间介绍下首次相聚的地点,极有可能在香港。”又说:“综合上述分析、论证,可知 1892 年宋嘉树在陆皓东同下,在香港与孙中山首次相聚,畅谈革命,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宋首次交往,奠定了日后革命同志和亲密战友的坚实基础。从此,宋嘉树在‘从事教会及实业’的掩护下,‘隐则传革命之道’,成为一个对上海辛亥革命作出贡献而很少为世人所知的革命‘隐君子’。”

两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人认识,还需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乍听真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至于说以“推测”代替事实,把“可能”说成“就是”,这已不值得一“辨”了。

1892 年,宋耀如开始经商,并宣布离开布道团,成为一手捧《圣经》、一手握钞票的上海传教士兼买办;而此时年方 26 岁的孙中山,刚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毕业典礼于 1892 年 7 月 23 日举行),是年(1892)秋被聘为澳门镜湖医院医师,由是开始行医的日子。至年底,他向镜湖医院药局借到本银两千元,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为贫病义诊”。第二年(1893)春,孙中山被澳门葡籍医生排挤,转去广州继续行医。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如同今天刚走向社会的研究生,刚谋得一份职业,一定要附会孙中山的《致李晓生函》,将孙宋两人的第一次接触“考辨”到是 1892 年,实在是枉费笔墨了。

对此,已有文章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看法。余菁在《同志、朋友、翁婿——孙中山与宋耀如》(2009 年)中说:“孙中山 1892 年的活动轨迹是翠亨、香港和澳门,并未到上海;而从孙中山致李晓生函内容看,孙中山始终强调的是宋耀如在上海的主题,说宋耀如有可能去广州与孙中山联系显然主观猜测性太强,不足为证。”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孙中山与宋嘉树》(2009 年)中大量引用了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2008 年)中的内容,大大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

于醒民、唐继无、高瑞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 年 11 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国内学者撰著的宋耀如传记中影响最早也是最大的一部。到 198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时,印数已达 5.5 万余册之多。该社 1997 年 1 月又以《宋耀如全传——宋氏家族第一人》为名分上下册出版。到 2008 年 5 月该书又再次出版,但书名改为《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出版社改为东方出版中心,著者只剩下醒民、唐继无,对这些改变,书中无任何说明。

此书在国内的影响实在太太,有太多的文章、著作的作者,全然不顾该书的小说家笔法,把一些可能是虚构的宋耀如的事情,当作“史实”来加以介绍传播。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那些严谨的治学者,对此书颇感头痛。

不足为据说。周伟民、唐玲玲在《美国杜克大学档案馆所藏宋耀如档案的学术价值》(2009 年)中说: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文学性小说,其中许多情节是虚构的,因为(宋耀如)资料十分缺乏,小说家言不足为据。

毫无学术价值说。黄亚平、宋时娟在《宋耀如、倪珪贞生平史实若干问题辨析》(2009 年)中直指该书“是一部传记类文学作品”,毫无学术参考价值:该书在国内大众层面的影响非常大,对学术界的影响也不小。该书易被当作信史看待。但究其全书性质,大量的情节纯属虚构,非但不能算作学术著作,就连文学传记也称不上,只能算是人物类小说,毫无学术参考价值。

其实,对于要“考辨”孙宋首次接触历史的沈渭滨来说,他对此书也是心有纠结的。他在文中引用了书中不少内容,但心中不踏实,所以又不得不不说:“引宋嘉树的这些话,由于作者都没有注明资料来源,而且全书带有明显的文学描写色彩,不足作为可靠史料予以采信。但考虑到作者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史学工作者,自称写作本书前曾广泛查阅了国内外各种报刊、档案,力所能及的访问了宋家亲友并加以考订核实。所以虽不可尽信,但相信不是杜撰。我在宋嘉树早年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不得已录而用之,借以勾勒出宋嘉树早年思想的大体脉络。”

欲以“不足作为可靠史料”的、“不可尽信”的、“不得已而录用”的“三不”材料,来“考辨”历史的真相,给出结论,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这是可想而知的。 